

# 当下中国哲学的进步性和存在的若干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赵敦华

## 一、简要回顾

我所指的“当前中国哲学”是指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的19世纪80年代的哲学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哲学在那些岁月的历程，回顾一下在这个时期之前的中国当代哲学是有必要的。当代中国哲学初登时代舞台之时便表现出了它的创造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我把这个时期的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仅次于2200年前“百家争鸣”时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的活跃人物，如胡适、冯友兰、贺麟、洪谦、张岱年等人已被历史证明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奠基人。这些哲学大师与之后在港台地区的新儒家们将继承而来的传统思想与东渐而来的西方哲学相融合，从而为今日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而又宽广的基础。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之后，哲学的繁荣哲学悄然消失。受苏联影响，从5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歪曲为“共产党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种被歪曲的哲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到达了它的顶峰，当时“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引自《毛语录语录》）的宣传口号恰是当时哲学的真实写照。

## 二、发展进程

80年代的新政策为中国学者带来思想领域的自由新风。哲学研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迅速前进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哲学的进步性表现为以下几点：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自身传统。人们不再满足于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sup>17</sup>中首次提出，并之后成为正统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了能够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人本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以此来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还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其核心问题是在于回答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只能在马克思手稿或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找到。换句话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只可能要么是“回归马克思”，要么是“与我们同时代的马克思”。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成为了具有争议性的热点问题：自然辩证法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提法？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列宁，他们的思想的差异性？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有怎样的关联性？实践是否在马克思思想中是本体论的概念？马克思是否提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肖说，这些问题的争议性不仅仅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存在，也同样存在于其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左派分子（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右派分子（新右派和老右派）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有时候党派领导人会对这类的学术辩论耿耿于怀，有时也会施加影响。虽然学者都不会再因为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受到惩罚，但我们不应对于最低限度自由而感到满足。在学术领域争取言论自由是我们继续肩负下去的任务。

(2)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学者都从唯物主义模式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这种是由当时在斯大林之下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建立的。在1948年，他将哲学史解释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其中前者是进步的，而后者则是反动的。在30多年中，他的这种模式控制了中国的哲学。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过

<sup>17</sup>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四段，莫斯科，1945年出版

的西方哲学家以外，其它西方哲学家都被视为反动的思想家。西方古典哲学被视为马克思著作的注脚，而现代西方哲学则被指责为是颓废、虚弱无力、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物。而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有概念都进行划分，成为一种二元对立形式，比如物质（存在）和精神（思想）的二元对立。以物质是否先于精神为标准，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被贴上了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标签。在八十年代初，抛弃了日丹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独立学科。对于过去的中国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的研究也逐渐细分化，同时对于他们哲学思想的评价也是基于其哲学基础性的评价，而非一味地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一般唯物主义保持一致。在现在社会中，前人的思想以他们的人类文化和生命实践得以被后人所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三大主流儒、释、道思想从人文研究到媒体、民间文化，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在众多西方哲学家中，萨特、尼采、弗雷德、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当代大陆哲学家是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潮”的中心人物。而对于西方古典分析哲学家和现代分析哲学家，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大多数的学者也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3）哲学研究已拓展为一项综合性研究。在教育部编撰的学科目录中，哲学是一级学科，并包括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科技哲学和宗教学。这样的分类并不合理，但却全面展现了今日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通过分析哲学的这种综合性，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综合性的来龙去脉。

首先，哲学系在中国往往规模比较大。一个哲学系平均约有50教职员工和数百个从本科到博士等不同学历等级的学生。而在西方的大学中的哲学系的学科往往被设在几个不同的系或者学院里。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会设立在政治学系，而中国哲学设立在东方学或者是汉学之内，美学在文学院，而宗教学是一个独立的院系——神学院。这种差异性恰恰解释了中国哲学系的规模为何常常（并不总是）比西方哲学系规模大的原因。

第二，宗教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血脉关联，这种关联性而并不局限于对于宗教哲学的研究。为了进行宗教的跨学科性研究，北京大学在1995年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学系。由于宗教学科是哲学的分支，所以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作。其它大学也接受这种两系联体运作的运作模式。至今，大约20所大学在哲学系内建立了宗教学学科或者是开设了宗教学研究。在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宗教学研究热潮一部分是出自因国内外的宗教文化热和基督教研究热。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平行于其他二级学科。这意味着每个独立学科都彼此分离。诚然，学科独立有利有弊。独立学科设置使得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外，便于它们独立性地发展。但是，不利的是学科的设置造成哲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相互隔绝。在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好比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他将他的王国分割为三块，分给他的三个女儿，却最终发现自己无处容身。当前中国哲学家不是普遍地进行哲学研究，而是成为八个分支学科领域之中的一个领域的哲学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不必学习西方哲学。即使在他们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不需要现代西方哲学的知识背景。而对于哲学史中的某个哲学家或者某个学派的研究专家，要么是中国哲学的专家要么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但他们很少会进行跨越了中西方文化界线的比较研究。许多伦理学或美学的专家并没有足够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知识背景；而许多逻辑学领域的专家认为，逻辑分析哲学是外国哲学的领域；还有许多科学哲学的专家将“自然辩证法”作为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并且把逻辑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奎恩等哲学家作为与其它专业相关联的东西。我跟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担忧隔离的专业设置会妨碍学科分类所必需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影响到哲学本身的发展。

### 三、存在的问题

为了警示这种学科之间的自我孤立现象，我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大陆唯一英文杂志)上发表了六篇以《当代中国哲学:从对话走向创新》为标题的文章。在文中,我写道:

目前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需要面对一些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是否可以称其为哲学?中国哲学是西化了的伪哲学么?在没有任何东西方偏见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哲学的研究是否可能?并且如果可能,这种哲学研究如何进行?由于关键术语的缺乏,中国学者在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翻译上的难题。最近几年,关于如何翻译“Being”(在欧洲语言中,being与to on, esse, Sein, étant同意)的争论层出不穷。是否“Being”可以被直译成中文中的一个词?还是这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是跟中文中多个词有对应关系?如果前一个假设的成立的话,在中文中究竟哪个词与“Being”是直接对应的呢?“存在”、“是”、“有”都是“Being”的候选翻译,但哪个才是最合适的呢?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如何理解形而上学在不同文本中的整体性?这些问题不仅仅与西方哲学的翻译有关,与在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如何理解本体论也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在中国的术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Being”对应的词,而这却成为了中国古典哲学没有本体论的佐证。恩格斯将“是”与“存在”<sup>18</sup>等同起来的做法导致一些中国学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二级学科设置的束缚下这些问题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此这般揭示了在中国学术研究<sup>19</sup>中存在一种迫切需求,即急需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各自为政的研究状态。

我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能够解决上述提及的问题。但我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揭示出在纷繁复杂的争论中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哲学家这个群体中冲突的发展趋势可分为四类:(1)趋同性与趋异性、(2)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3)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判、(4)地域性哲学与世界性哲学。以下我将一一论述这些问题。

#### (1) 趋同性与趋异性

庄子曰,“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sup>20</sup>这句话恰恰点到了比较哲学的悖论:对比较哲学的研究能否从趋同性与趋异性入手。从黑格尔时代起,从趋异性入手的研究方法已然盛行。也因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有时被夸大。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思想跟西方哲学思想价值无法等同,中国哲学思想无法真正进入哲学领域。如西化派所料,中国传统哲学是否是哲学这个问题常常在汉学研究圈中反复提出。

奇怪的是,正当西化派的观点需要积极回应之时,中国哲学家们竟也提出了同样问题。德里达于2002年访问中国,他在公共场合谈到,“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本是他对于中国哲学带有其解构性思想倾向的认同,但却误导了一些中国传统哲学的专家学者,使得他们得出了“中国哲学没有合法性”的结论。他们认为中西思想之间的不同是在于两者思维方法或生活模式本质上的差异性。西方人创造哲学,通过哲学表达他们的思想和生命实践,并通过哲学来追求真理和确实可靠的知识,因而它带有逻辑推理、概念分析、二元对立观等鲜明特征。中国哲学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在这场争论中,一些捍卫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学者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恰恰正是中国哲学的特征,我们应当抛弃西化模式的哲学,中国人应该“思己所思,独善其身”。

就我看来,双方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就“中西思想的本质存在差别”已达成

<sup>18</sup> “Wenn wir vom Sein sprechen, und bloss vom Sein, so kann die Einheit nur darin bestehn, das alle die Gegenstände, um die es sich handelt—sind, existieren.” 《马恩全集》第20卷,柏林出版

<sup>19</sup> 《中国社会科学》,第26期,2005夏第一辑,第110页,第11行,引用时已修订;

<sup>20</sup> 《庄子》,第5章,第2段;

一致。双方都同意，有一个本质性东西可以区分中国和西方思想。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思想的这种本质是否是哲学性质的。关键点是，中西哲学本质差异的对立性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它并不存在。逻辑推理和想象性思维、概念分析和整体性思维、二元对立和统一、真实可靠的知识 and 玄妙的佳言妙句以及对于真理的追求和着眼于道德体悟，这些差别并未能为区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提供充分性和必要性。大多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和现代的哲学家，诸如帕斯卡尔、尼采，孔夫子、老子都留下了很多玄妙的箴言，而孟子、荀子的哲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有其逻辑思想。奥古斯丁和董仲舒在整体世界观的论述上有着共谋之处，同时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对分析推演都有浓厚的兴趣。而朱熹和阿奎那的理论都带有综合和分析性的特点。无庸赘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把关注点放在了真理和美德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中西方哲学在本质上乃是贯通的，反之亦然。

我不否认中西哲学自身的体系不同。但体系上的差异并非源于不同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性，而是源于哲学史的编撰方式上的差异。在西方，以哲学史这样系统介绍哲学的方式开始于17世纪中期。吉尔基荷姆的雷登、托马斯·斯坦雷、雅可比·布鲁克尔，以及之后的黑格尔，都有哲学史性的著作。尤其是黑格尔在其哲学史中纳入了他的哲学体系。而在中国，系统地叙述中国哲学历史的著作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出现。胡适和冯友兰担了这一重任。很凑巧，胡适与冯友兰当时都在美国求学，在回国之后马上开始中国哲学史的编撰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从一开始就是西化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对他们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划分单元上产生了影响。王国维，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曾经这么说过，“虽无‘哲学科’之名，却有‘哲学科’之实”。当时中国哲学的研究急需规范性的训练。中国哲学惟有进行自身的史实收集并整理形成一个体系，才能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学科。但正如西方哲学史虽成书于17世纪，但其历史之悠久仍远可追溯，中国哲学在有一部历史之前并不是没有史前的中国哲学的。

写著一部哲学史是对于历史的一种重构，故而须遵循诠释学的叙述原则。历史的重构与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相关联，而不是一种武断的阐述。这里必然存在叙述方式的好与坏。从趋同性与趋异性所涉及的领域来看，前者优于后者的理由无迹可寻。之前提到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模式是将所有的哲学理论以恩格斯区分物质和精神的方式进行归类。这种的整体性的方法是很失败的。可它的失败并不是证明了已在主流的比较哲学中流行的从趋异性入手方法的正确性。与此相反的，我倒是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从趋同性入手的方法远从趋异性入手的方法更为合理。我将从实践和理论层面来证明我的观点。

## (2)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相较于普遍主义的清教，马克思·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倾向持有批判态度。他说，哪怕再过80年，他的这个观点依然成立。正当普遍主义被判定为一种西方偏见而被后现代主义否定时，特殊主义被视为中国哲学特性而因其重要价值被普遍推崇。这种特殊主义旧瓶装新酒，被称为“中国特色”。自从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的过程和学说定义为中国特色，御用文人把中国特色当作“政治正确”的廉价标签广泛地用于各个学科和社会领域。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中国特色法制、中国特色法学，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国特色政治学、当然在此之中也会有中国特色哲学。

一个国家采用有自身特点社会政治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获得某个具有国家特色的奖项为荣，而不担负起普及知识和文化的责任，这是非常态的。我曾经把中国和犹太的思想家一起做比较。两者都拥有古老的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是，犹太思想家以人类使命为己任而着眼于四海。如果他们仅仅投身于犹太民族文化的发展，那么就不会具有世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会有弗洛伊德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

不复存在。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文化相对主义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道德倾向的民族主义。特殊主义也在中国学术界的泛滥。正如安东尼·史密斯观察到的，“这种道德民族主义构建和维系着文化整体认同感，且带有很明显的特点，比如共同的祖先和血缘的神话传说、民族中心主义和优越感，反抗殖民化的群众运动以及持有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坚分子。而在中国特色哲学中，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特征。”<sup>21</sup>中国哲学领域的文化保守者声称 200 万以前的中国先民的起源是非凡的，且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断进步，以此来证明中国思想具有无以伦比的价值。为了能够凸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角色。他们自大地预言，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并散步了毫无事实根据的消息，消息称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在巴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称“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人类无法得以安生。”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世界的，我们是青春的”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最美好的歌曲。但是如今我们听到的不和谐的声音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最古老的”。

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将“中国特色”作为新手段来防止社会主义在中国跟在苏联和东欧地区一样遭遇失败。他们将全球化视作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新阴谋。为了瓦解这种阴谋，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与后现代理论进行结合，并向公众推广。讽刺的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中指出：反全球化是“过激主义者的积怨”，是“片面的，狭隘的”。他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被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使得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隶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国家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使东方隶属于西方”，“由多种民族的和地区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22</sup>这些表面上“政治错误”的说法仍然确实出自于马克思本人，正是许许多多马克思的追随者违背马克思的全球化的立场。

时髦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十分追捧后现代主义批判西方普遍性传统的做法，诸如对真理、逻辑中心主义和独断论的批判。这些对他们而言都是文化特殊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这些人找到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例子，发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他们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这些发现使他们颇为骄傲。“西方后现代主义正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的格言影射出了西方批判性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联系。

多数教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校都认为不同的哲学都具有普遍性的本质。那些矛盾的说法并没有证明“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偏见或者是假想”的合理性。而持有普遍主义观点的哲学家被赋予与其它哲学沟通的重任。因为只有通过他们与其它哲学的有效对话才能够达成普遍共识。更重要的是，对于普遍主义的理解不是一个“在手”的事物，而是一个急需重建的事物，一个需要被实现可能性，一场合作性对话的结果。我与很多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哲学的普遍主义潜质不仅仅对于中国人至关重要，对全人类亦然。如果人权和民主制度不过是某一个文明在一个历史阶段的偏见而已的话，或者仅仅人权和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达成认知能力上的共识基础上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意义都将不尽相同。

### (3) 意识形态与其批判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反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以及传统保守主义如何结合在一起满足新集权主义的需求的。在关于这类意识形态的辩论

<sup>21</sup> 《政治文化：民族和民族主义》，A. D. Smith 发表于《人类学百科全书》Tim Ingold 编，2002 版本，第 706 页，第 33 段

<sup>22</sup> 《马恩全集》，第六册，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6 年出版，第 488 页

中，一些知识分子加入到了自由主义，启蒙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之中。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哲学看似是一个充满了各类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战场。很多中国的哲学家接受了非意识形态立场，并渴望一种“纯”哲学。结果是他们躲进了象牙塔，与世无争地做着解释哲学文本的研究工作。这种“纯”哲学引起了大众对于哲学的功用的疑问。西方哲学家经常用一种辩证的回答来应付这种追问，他们说“哲学是事实而非的东西”。与此相似的是，中国人的答案是“哲学的大用即是无用”。但是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无法掩盖哲学在公众信任和社会功能两方面已遭遇到了危机的事实。

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大众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经历着划时代的改革。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的不公正、暴力、欺骗、腐败、环境污染、权力的滥用和无用在社会生活中很常见。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应当带着问题参与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去。如何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这个问题在西方似乎已经过时，但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正当且相当紧迫的问题。

哲学一旦对公共事务有所关心，就不得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中。尽管意识形态这个词已臭名远扬，但却不意味着一切意识形态都一样的糟糕。最有可能的是，总有一些比其他来得好一些。举例来说，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诚然遭受到了很多非议，但是它依然是“为了避免更坏的情况而做出的最佳选择。”

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选择是艰难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思想相比，孰优孰劣，根本无从比较，反之亦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比较，也是如此。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理应保持住批判性的态度。批判理论早已点明了这种选择的进退两难的原因，即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批判意识是早已植根于这个意识形态中的。在中国，批判工作需要更糟糕的意识形态进行谴责，同时对于所谓的好一些的意识形态也理应保持批判态度。考虑到这个社会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难度和广泛性，选择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然后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也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非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对于解决其它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并非毫无价值。民族主义可以促进团结，但另一方面却对于处理国际关系来说并非良策。多元的意识形态会改善这些情况。为了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斗争需要妥协。毋庸置疑，哲学对话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甚至在这些变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哲学的任务并非紧跟西方“去意识形态”的潮流，也不是继续维持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积极开展批判性的反思和充分的对话，汲取不同意识形态中之长。

#### （4）地域哲学和世界哲学

哲学通常被分为德国和法国哲学(或大陆哲学),英美(或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以及印度、日本、中国哲学、阿拉伯哲学等。以国家或地理为标志的哲学分类混淆了地区性的哲学与一个地区的哲学之间的差异。所以我在这里区分一下中国哲学与在中国地区的哲学。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在中国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地区意义上的纯中国哲学已经不复存在。在当前的中国哲学包含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已经基本概况性地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争议性的典型问题。这也显示出了问题的多样性。由于几乎所有地区性的哲学都被引进和吸纳入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最可能成为世界哲学的舞台。

“世界哲学”是冯友兰在1948年发表的《四十年的回顾》中提到的概念。他谈到，“在我看来，世界哲学里包含着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比西方哲学更神秘的东西。”<sup>23</sup>他将“世

<sup>23</sup> 英文文本从冯友兰选集的《三松堂全集》中文文本译出，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3页

界哲学”视为中西哲学的比较与融合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我们已经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哲学的降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来,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视和哲学的学科大力推广也使得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得到了普及。中国是一个英文比中文更流行的国家,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认识远比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更为深刻。由于对于中西方哲学的熟知,中国哲学家在进行比较哲学工作具有极大的优势。印度哲学家,在很多年以来也享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印欧语言具有的共同性反而遮盖了东西方哲学的一些根本差别。相比之下,我深信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两者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世界哲学的发展方向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正与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一致。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对于哲学的未来发展有这样的语言,“哲学将会终结于一个将不同的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独体的体系中。它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般哲学并于世界相关联。它将哲学当代世界的哲学……它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会成为世界的,而世界会成为哲学的……并成为世界公民。”<sup>24</sup>按照青年马克思的说法,世界哲学是一般哲学,也不是某一特定制度,例如针对妇女提出的特殊制度等。世界哲学不仅是跨学科的,也是跨文化的,更是跨越了多种多样区域障碍的哲学。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的比较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潜力必将促成世界哲学的诞生。如上所述,这些条件包括:从趋异性方法转向趋同性方法,从狭隘的特殊主义转向视野开阔的普遍主义;从国家集权的意识形态转向对于它的批判;同时与哲学家的国际性团体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而我本次出席复旦大学哲学系五十周年系庆,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而来的。

---

<sup>24</sup> 《马恩全集》,第一册,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195页,第6段。